

深刻认识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意义

陈明星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6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基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工农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科学把握而对城乡关系认识的再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在全国前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对城乡关系认识的再深化

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经历了从二元分割到加速融合的转变。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并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7年，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并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时提出县域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打破城乡分割的规划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县域一盘棋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体制，形成城乡互动、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由此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

从二元分割进入统筹推进的新阶段，统筹是关键路径，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协调发展是重要目标。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水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由此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并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特别是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表述上，“全面融合”是着眼到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协调发展”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十四五”时期发展并展望2035年远景提出的目标要求，主要路径是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

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这是对城乡关系的新论断，突出强调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目标

要求，也是重要手段，不仅要“以城带乡”，也要以城乡融合“带乡”，这是基于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工农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的科学把握而对城乡关系认识的再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标志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从目标到手段、动力源的进阶，也标志着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基点由立足乡村向城乡融合的全方位、全覆盖的跃迁。

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意蕴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城乡关系演进。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树立大历史观来审视城乡关系演进，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战略主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用大系统观来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传统城乡分割模式将城市与乡村视为独立单元，导致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被行政壁垒、制度障碍割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融合日益深化，乡村所承载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不断上升，进而推动乡村功能的提升和乡村地位的攀升。因此，要树立大系统观，一方面将城乡融合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

将城市和乡村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大系统，加快构建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其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畅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以更有力度的政策举措引导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将乡村资源产业链、创新链的重要环节，将乡村价值转化为产业配套。

用大文明观来拓展城乡发展空间。伴随着人口负增长、城镇化、逆城镇化等趋势叠加，城乡在人口分布、生产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等方面加速重构，农户、村庄都将呈现加剧分化的走势。为此，要顺应人们对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优美生态环境、现代城乡文明的需要，树立大文明观来拓展城乡发展空间，强化城乡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分把握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客观现实，积极引入现代文明，推进市场意识、契约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开放意识、合作意识等现代文明向乡村辐射，促进现代文明与田园风光、乡村风情相得益彰，并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彰显乡村文化生态个性魅力，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大力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价值转化，推进城乡文明共生共享。要科学把握城乡人口变化、流动的态势和趋势，把握乡村的差异化及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村庄发展，建设和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使乡村空间布局与城乡人口流动格局的动态变化相适应，形成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乡村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要素供给、治理机构等匹配机制。

用大安全观来提升城乡治理效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

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涉及城乡要素重构、利益格局调整、治理体系转型等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惯性，以及城乡问题的交织叠加，城乡融合发展越深入，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就越多，风险和挑战就越凸显。因此，必须树立大安全观，积极创新城乡治理，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底线思维嵌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治理体系等各环节各领域，加强风险防控，切实保护好农民利益、粮食安全和乡村生态安全，以城乡高效能治理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高层次融合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取向

积极推进工作机制与政策工具转型。既聚焦“三农”抓“三农”，又跳出“三农”抓“三农”，超越传统的条块式要素配置模式，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统筹跨部门、跨地域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力量，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合力。坚持运营前置，注重运用市场思维，依靠市场手段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结合乡村特色产业、特色文化及地域元素，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统筹谋划相关业态，构建品牌化运营体系。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保险、期货等政策，进一步完善引导基金、财政贴息、担保补助、保费补贴、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财金联动政策，吸引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深化劳务协作，提升转移就业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强“豫农技工”“乡村工匠”等培训培育，推动返乡创业、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等各类人才入乡下

乡发挥作用。

强化县域作为重要载体的功能定位。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除了要以持续强化中心城市、都市圈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外，重点要强化县域的重要载体功能，推动县域“融圈入群”，增强资源链接与市场对接能力，加快提升县城发展能级促进“强县兴城”。注重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城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培育壮大县域经济，赋予县级更多的资源整合使用权，强化县乡村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统筹力度，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推进县城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提升县城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

因地制宜找准带动点和切入点。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发展方向等，因地制宜找准带动点和切入点，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动力。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积极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进信息共享，打破数字垄断、信息隔绝、信息孤岛等现象，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加强信息化及农业农村科技推广应用，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着力优化乡村营商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完善城乡融合的考核评价机制，促进城乡资源要素顺畅流动。着力创新乡村治理，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优化乡村治理主体，创新乡村治理手段，运用大数据等先进科技手段，建设乡村治理信息系统，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河南日报

着力推动健康消费提质升级

石明明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新时代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我国新型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健康消费，既是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为此，要着力推动健康消费提质升级，在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劳动能力，更要拥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健康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消费是人们通过医疗保健、运动健身、生态居住等消费形式，对自身生命质量进行维护与提升，包括健康食品、健康服务、健康产品、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消费。

发展健康消费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通过不断丰富健康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健康消费的城乡基础设施，能够更好提升生活质量、增进长期福祉。发展健康消费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通过购买健康产品和服务，推动从“治病”到“防病”、从“延长寿命”到“提升生命质量”转变，帮助劳动者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更多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发展健康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一方面能够催生健康领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流程、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比如，在农业领域，人民群众对有机、绿色、无添加产品的需求，将引导农业企业加快向生态化、智能化转型；在制造业领域，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的品质追求，将激励企业不断研发新材料、改进和应用新工艺，降低对健康不利的物质资料使用，全面提升产品质量；等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健康消费快速发展，健康消费市场呈现出规模快速增长、业态模式不断创新、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等特点，预防式健康产品、卫生防护用品、家用运动健身器材等各类健康消费市场火爆。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模达到9万亿元。同时需要看到，健康消费还是一个新兴领域，仍然存在高质量供给不足、健康知识普及不够、消费环境欠佳等问题。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开展健康消费专项行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10方面重点任务。这些政策措施为推动健康消费提质升级指明了方向。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推动健康消费提质升级，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具体来看，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增加优质健康产品供给。推动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向场景驱动的“产品+技术+服务”生态体系建设转型，鼓励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创新，打造完整的健康产业链条，推动健康与文旅、养老、体育、线上线下零售等多业态多场景融合；引导健康产业聚集发展，强化健康服务生态系统建设，形成健康产业聚集的协同效应。

二是发展多层次健康消费市场。支持面向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养老生保健等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壮大银发经济；加强对年轻群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导，丰富健身运动等消费场景，发展具有引领性的时尚休闲运动消费市场等；大力发展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新型服务业态，提升差异化、智能化、定制化服务能力。

三是完善健康消费环境。深化特殊食品注册备案制度改革，完善保健食品事前审评和事后评价机制，引导诚信合规经营；引导企业严格遵守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权，在获取信息、进行检测、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事先将可能发生的风险、费用等清晰告知消费者，营造规范有序的健康消费市场环境。

来源：人民日报

中央八项规定奠定长治久安坚实基础

张 严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从整治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小见大，以小博大，以上率下，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深刻影响着党的建设与发展。

其一，坚持防微杜渐。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出的高度历史前瞻性，正是契合了这一理念。

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谈到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时提出，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作风问题往往始于细微之处，如果不及时发现纠正，任由其发展，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且悄然如温水煮青蛙，日积月累，量变引起质变，最终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因此，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趁早、趁小，早发现、早排除，将不良作风消除在萌芽状态，以“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的态度，常“带毒”，治“未病”，在作风建设上未雨绸缪。所谓“尽小者大，慎微者著”，通过对公费吃喝、公车出行、文山会海等看似细微却关乎作风根基的问题进行严格规范与整治，早发现、早铲除不良作风的萌芽，保持定力、寸步不让，守住重要节点，紧盯薄弱环节，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坚决守护党的纯洁性与

先进性。这正是从源头上堵住“蚂蚁之穴”、预防“针芒泄气”，为党坚守初心、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主动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监督的生动体现，是具体化、现实化的“三省吾身”，是自我革命的微观形态和直接形态，彰显出高度的自律和自觉。

在党的发展历程中，自我革命始终是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央八项规定从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等具体方面入手，要求党员干部时时刻刻审视自身行为，是否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是否做到求真务实，是否做到勤俭节约等。这是党对自身建设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新时代我们党主动查找自身不足，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直观措施和微观路径。不同于那些因外部压力而进行的被动变革，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与落实是我们党基于对自身初心使命的再省视、再认知，对群众急难愁盼的再聚焦、再回应，主动开展的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种主动约束、主动自律、主动变革，不仅是对党员干部个人党性修养的考验，更是我们党有勇气有能力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生机活力、赢得群众信任和支力的关键。

其三，做到常态长效。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作为系统、常态化制度的预防制度，中央八项规定通过完整、可执行的长效性制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以“小切口”推动作风“大转变”，成为从制度层面截断腐败生成链条的关键一环。

从制度设计看，中央八项规定涵盖工作、生活中的多

差异化是文旅产业健康发展关键

李 芳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文旅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与文化繁荣的关键力量，正呈现出盎然生机。其承载着文明传承的使命，让历史文脉在当代生活中绵延赓续；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以文化软实力赋能经济硬实力；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通过文化符号向世界展现国家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旅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数据显示，我国2024年国内出游人次56.15亿，同比增长14.8%，旅游花费同比增长17.1%，文旅产业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如贵州赤水依托世界自然遗产打造的生态文旅模式，使12个深度贫困村人均年收入5年间跃升逾5倍，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振兴路径；山东日照则通过业态升级与消费提质，在2025年“五一”假期创造出营收增幅超“黄金剪刀差”，为城市文旅从“流量竞争”迈向“价值创造”提供了典型样本。在消费升级、技术革命与政策红利的共振下，文旅产业展现出巨大潜力和蓬勃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千景一面”的顽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独特性与生命力。从“我在XX很想你”的网红路牌复制粘贴，到各地仿古镇“查重率高达99%”的尴尬，不少游客慨叹，唯有“似

曾相识”却无“独一无二”。此外，文旅营销也陷入了同质化泥潭。文旅自媒体盲目追逐热点，内容重复度过高，浮于表面的口号与滤镜下，是文化底蕴的苍白。若将小桥流水简化为布景板，将民俗符号异化为流水线商品，所谓“特色”便只剩躯壳，失了血脉。当古镇沦为网红元素的堆砌，当文化被镶在框里、挂在墙上，文旅便成了无根的浮萍。

幸而，在文旅同质化迷局中，一些地区以文化为锚、创新为帆，探索出差异化发展新航道。如山西省万荣县依托黄河与汾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将古建筑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2024年游客量同比激增94.7%；甘肃敦煌以沉浸式演艺项目让千年壁画“活”在指尖，全球首部洞窟式体验剧《乐动敦煌》接待观众超60万人次；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则将老窑厂改造为艺术空间，保留工业遗存，引入600余家文创企业和机构，年接待游客超百万。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创新是活力的源泉，唯有以“破”解局，以“立”重生，方能突破同质化桎梏，成就“各美其美”的文旅发展新景象。

“破”形式复制之弊，立“文化深耕”之本，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地方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与活化再生。可建立文化资源系统性梳理机制，通过学术研究、口述史整理等方式，提炼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推动

文化表达创新，将传统技艺、民俗仪式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得以触摸真实、独特的地域文脉，让文化从“背景板”变为“主角”。

文旅发展不能陷入“景点思维”的窠臼，须打破行政壁垒与产业边界，构建“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一方面，应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科技等领域深度融合，发展乡村研学、工业遗产旅游、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另一方面，须建立区域文旅协同机制，通过线路共推、品牌共建、客源共享，寻求特色互补与价值共生，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文旅同质化背后往往是急功近利的发展逻辑，须构建“规划—治理—运营”全周期管理体系。在规划端，建立文旅项目准入评估制度，将文化独特性和可持续性纳入考核指标。在治理端，构建党政引导、市场主导、社区参与、智库支撑的“文旅治理共同体”，以政策杠杆与金融支持激发可持续发展动力。在运营端，建立业态动态更新机制，以年度评估与主题更迭保持文旅市场新鲜度，针对年轻群体、银发族和亲子家庭等主力客群，建立动态需求响应机制。

文旅同质化之“破”，破的是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文旅特色化之“立”，立的是文化自信与发展智慧。当文旅开发从“复制粘贴”转向“深耕细作”，从“单点突围”转向“生态共建”，从短期逐利转向长效发展，方能真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绘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来源：光明日报